

壹、緒論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再製論點是教育社會學和階層化研究者瞭解社會階級再製現象的重要理論依據，藉以探討文化資本與階級再製的關聯，例如檢視文化資本對子代學業表現、教育分流或學科成績的影響（引自李文益，2004；李文益、黃毅志，2004；張芳全，2006；許崇憲，2002；陳怡靖、鄭耀男，2000；DiMaggio, 1982; DiMaggio & Mohr, 1985; Kalmijn & Kraaykamp, 1996）。這些研究多發現家庭的文化資本會影響子代競逐稀少資源的機會和成就取得的結果。然而，當中的因果關係卻常認為是家庭具備高文化資本，導致子女的教育成就較高。這樣的解釋過度簡化家庭文化資本和子代成就地位之間連結的複雜性，忽略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代間移轉過程及不同形式資源的可轉換性，因而無法清楚說明文化資本究竟如何對教育成就產生影響。若能解開此一含混未明的機制將有助瞭解文化資本的真正效力。

本研究認為探討文化資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力之前，應先檢視文化資本如何從親代傳承至子代，才能進一步澄清文化資本對子代學業表現的作用。依據 Bourdieu 的理論，本研究認為父母可能透過兩條路徑幫助子代累積文化資本。第一是父母自身具備對文化資本的理解與認同，透過帶領子女參與各類文化活動來幫助子代瞭解高雅文化，進而讓子代累積對文化資本的親近與善意（goodwill），稱為「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路徑」。其理論意涵為 Bourdieu（1986）所討論的身體化文化資本（the embodied state），藉由親子共同參與文化活動而將親代在精神與身體上所蘊含的秉性形式「傳遞」為子代文化資本的過程。第二是家長透過家庭的經濟資本優勢投資子女參加各類才藝課程，培養子女對高雅文化的喜好與熟習，稱為「經濟資本的代間轉換路徑」。其學理依據為 Bourdieu 所論述的客體化文化資本（the objectified state），藉由父母購買文化課程而將親代所擁有的外在物質財貨「轉換」為子代文化資本的過程。在本研究中，若子女也如同父母一般具備對菁英文化的熟悉與認同時，即可視為文化資本已內化成功而傳遞或轉換為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稱之為「子代文化善意」。換言之，父母具備的文化資本會經由這兩條路徑「傳遞」和「轉換」為子代的文化資本，然後才對子代的教育成就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文化資本影響教育成就的討論著重於資本代間的「傳遞」和「轉換」之可能性，以及產生的結果。本研究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合併國中學生、家長與導師等調查資料，首先分析文化資本代間「傳遞」和「轉換」此兩條路徑之效力，釐清不同社會階級的家庭資源差異。接著，探討內化後的子代文化資本對子代教育成就的影響，將資本「傳遞」和「轉換」的機制納入以往研究檢驗的文化資本和成就取得的因果模型中，嘗試勾勒文化資本對教育成就的運作機制。此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提供一個經驗證據的支持，說明透過上述兩種路徑而來的文化資本對子代學業表現的

影響，進而檢視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再製論點對臺灣教育場域的有效性及其中更細膩的因果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再製論點

文化資本理論在量化研究過程仍有不少爭議。相關研究多涉及「如何對文化資本概念進行適切測量」與「文化資本是否真的再製社會不平等」之論辯（如謝志龍，2009；蘇船利、黃毅志，2009；De Graaf, 1986; Farkas, Grobe, Sheehan, & Shuan, 1990）。正因為如此，國內、外眾多的研究結果相當分歧，有支持文化資本效力者，也有持反對意見者。然而，本研究嘗試從另外一個角度反省文化資本的效力，研究者認為既有研究忽略 Bourdieu 的資本傳遞與轉換觀點。本研究將從文化資本的代間內化過程及其對國中學生教育成就的影響進行分析，據以檢視父母傳遞文化資本給下一代的路徑，以及子代文化資本對於教育成就的影響效果。

（一）文化資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

對 Bourdieu 而言，資本是交換系統中藉以獲得權力和地位的一種社會關係累積，它可延伸到所有稀少且值得追尋的物質性或象徵性商品；其中，涉及象徵性、非經濟性的社會關係累積就是文化資本（Barker, 2004）。文化資本最重要的特點是區別效力，上層階級經常藉由展現高雅文化品味，諸如生活風格、信仰與慣習等來區辨與其他階層的不同（Bourdieu, 1984）。因此，文化資本被定義為具備社會或文化排除、已經約定俗成、被形塑為高地位文化的廣泛符號（Bourdieu & Wacquant, 1992; DiMaggio & Useem, 1978; Lamont & Lareau, 1988）。

擁有豐富家庭文化資本的下一代一開始就占據先天之利，得以長期在家庭中累積豐碩的文化資本（Bourdieu, 1986）。更由於社會上層的精緻文化在學校中屬於主導文化，因而上層階級的學生經歷家庭環境的長期薰陶，在學校容易與教師有較佳的互動關係，教師對其課業學習給予較多關注、更深期望，學生將更容易獲得高分（Bourdieu, 1984）。換言之，高社經地位學生的家庭生活方式讓他們進入學校後相當容易熟悉學校的運作邏輯，有助學生入學後的表現，以及有利教師對學生的正面評價（Bourdieu & Passeron, 1977）。

依循 Bourdieu 的理論，多數研究都認為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具有正向關聯。DiMaggio（1982）證實在學校若僅有能力並不足以取得好成績，反而是文化資本明顯有利於學業表現；DiMaggio 與 Mohr（1985）的研究也支持文化資本對大學入學率、大學畢業率、繼續攻讀研究所的比率都具有助益；Kalmijn 與 Kraaykamp（1996）檢證學業成就與文化資本所連結的不平等問題，發現高地位文化與高學業成就之間有正向關係；一些國內研究也說明臺灣社會存在文化再製的現象，主張家庭背景透過文化資本作為中介變項而影響學童的教育成就取得（李文益，2004；李文益、黃毅志，2004；張芳全，2006；許崇憲，2002；陳怡靖、鄭耀男，2000）。